

刘正·著

金文庙制研究

王正


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文庙制研究/刘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04-4251-3

I. 金… II. 刘… III. 皇室—祭礼—研究—中国—商
周时代 IV. K89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276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订 海东装订厂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论 金文庙制研究的一般见解和问题点	(1)
一 金文庙制研究的历史回顾	(1)
二 金文庙制研究的问题点	(14)
第一章 金文中的大庙和诸庙	(34)
一 金文中所见大庙考	(34)
二 金文中所见周王室诸庙考	(66)
第二章 金文中的宫和诸宫	(78)
一 金文中所见宫考	(78)
二 金文中所见周王室诸宫考	(80)
三 金文中所见康氏诸宫	(107)
四 金文中所见方位诸宫	(131)
五 金文中所见诸师宫	(141)
六 金文中所见其他诸宫	(153)
第三章 金文中的室	(167)
一 金文中所见太室·大室考	(167)
二 金文中所见其他诸室	(173)

第四章	金文中的寝	(182)
一	金文中所见寝考	(182)
二	金文中所见周王室诸寝	(187)
第五章	庙制和礼制	(191)
一	告庙制度研究	(191)
二	毁庙制度研究	(201)
三	迁庙制度研究	(204)
第六章	庙制和礼制	(224)
一	用牲问题	(224)
二	用舞人数问题	(228)
三	盟约和宗庙用器	(229)
四	宗庙祭品问题	(232)
五	姓氏异同问题	(234)
六	四时祭祀问题	(237)
后 记		(249)

引 论 金文庙制研究的一般 见解和问题点

一 金文庙制研究的历史回顾

在古代经学史上，对殷周庙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三礼的解说性著作中。其中，与此相关的最有名的专题著作是清代礼学家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一书。此书以对三礼的注释为核心，对历代丧葬制度进行了资料性汇集和分析说明。在他之后，朱孔阳写有《历代陵寝通考》一书。当然也是以对古代中国历代丧葬·陵寝制度的研究为主。但是，上述著作集中研究了秦汉时期的丧葬·陵寝制度和构成，旁及到明清，而恰好短于对殷周庙制的基础性研究。因为在传世的有关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对殷周庙制的具体建构问题的说明只是寥寥数言而已。对于西周，《史记》、《尚书》、《左传》和《竹书纪年》等著作中也是面对“文献不足”而“不敢赞乎一辞”的，更何况后人？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要想研究西周历史和文化，我们所能利用的最为直接和可信的史料就是青铜器铭文了。在现今已经出土并记录下来的上万件有铭文的铜器。这些铭文，短则单字，长则接近五百，如《尚书》一般，为研究西周史提供了极其珍贵而又真实的原始资料。长期

以来，历史学界都把殷周青铜器铭文作为研究商周史的重要参照物和立论的依据。

对于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研究核心的学者来说，清人对秦汉庙制的研究自然叫我们不甚满意，然而现当代的学者们的研究又如何呢？杨宽先生在 1985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也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古代礼学专家们的以对三礼研究为核心的著作，只是有部分内容涉及殷周庙制的产生、发展、种类三者和周代礼仪与礼法制度的关系问题，却又缺少对此问题的专业化研究，更没有人利用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有关史料对三礼中有关殷周庙制的记载进行考证和比照。而这正是欧阳修所谓的“礼家明其制度”说的最为核心的体现。晚清时代著名的礼学家和金石学家孙诒让，尽管他的《周礼正义》和《古籀余论》等著作代表了清代乾嘉之学在三礼、金石研究方面的一流成果，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殷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殷周庙制问题的史料对于考证殷周礼制及三礼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对于解决原始儒家礼教思想的形成问题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他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进行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庙制问题研究的当然人选。

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可能是进行这一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在 1913 年发表的《明堂庙寝通考》一文利用了二十余种殷周铜器铭文史料，研究了殷周庙制中大室和明堂二者的具体格局问题。这就如同为推动对殷周庙制的研究注入了一剂活性催化剂一样，从此拉开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序曲。

（一）殷周庙制发展史

古代中国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们建构出一幅由夏至周的庙制

发展史。但是，对这一发展史的建构却有两种观点存在。

以《礼纬·稽命征》一书为代表，认为：

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

夏，四庙；至子孙，五。

殷，五庙；至子孙，六。

此说重点在于通过对“周因于殷礼”的证明，从而达到否定周庙的真实存在这一目的。如果夏的四庙不包括始祖庙的话，那么夏朝立国初期并不注重对祖先的祭祀，这或许是和夏启的“石破北方而启生”的异常出生神话有直接联系。可参见《汉书》颜师古注引《淮南子》佚文中的有关记录。四庙说的提出，为亲庙地位的建立提供了历史依据。

以《孝纬·钩命诀》一书为代表，认为：

唐尧，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

禹，四庙；至子孙，五。

殷，五庙；至子孙，六。

周，六庙；至子孙，七。

此说提出的意义在于把周庙地位的提升，注重的是周礼对殷礼的“损益”。在这里也是主张夏朝立国初期的四庙说。同样都是纬书，却有两种不同的庙制发展史观。看来，作为纬书，仍然维持着孔子思想的正统性。

但是对两派观点都赞同的四庙说，在青铜器铭文中的具体例证如下：

《戊嗣鼎》：“用乍父癸宝饗。”

《弭叔簋》：“用乍朕文且宝簋。”

《岗劫尊》：“用乍朕高且宝尊彝。”

而在著名的《史墙盘》（见图1）和《疾钟》（见图2）铭文中则一连出现了七世祖先的姓名：第一世高且，第二世烈且，第三世乙且，第四世亚且，第五世乙公，第六世丁公，第七世疾。《史墙盘》和《疾钟》是属于西周时期之物，连续出现七世祖先的铭文，正可以印证了在西周庙制问题上“至子孙，七”之说的准确性。同时这七世祖先同时出现也意味着一种大合祭祀制度（禘祭）在周初的正式形成。在《逸周书·世俘》中也记载了武王克殷之后大合祭六位先公先王的情况：

王列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

可见大合祭制度和殷商的凡先祖皆受祭祀的现象是有一定继承性质的。而在吕大临的《考古图》一书卷三二中所收藏的一件簋器，其铭文中出现了“乍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四世之名（见图3）。为此，他解释说：

祭及四世，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庙，而祭必及高祖。武伯龚伯，其祖考之为大夫者，以溢配字，如文仲穆伯之类。益公文公，其曾高之为诸侯者。大夫祖诸侯，末世之僭越也。

大夫三庙之说，最早可见《周礼·王制》中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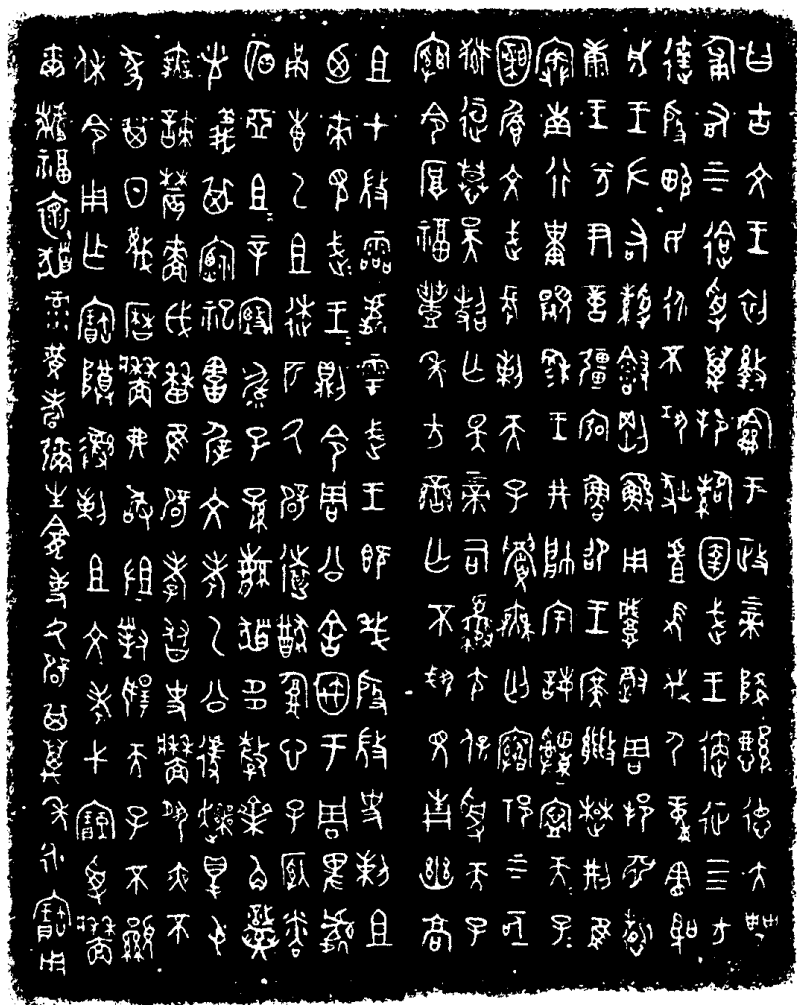


图1 史墙盘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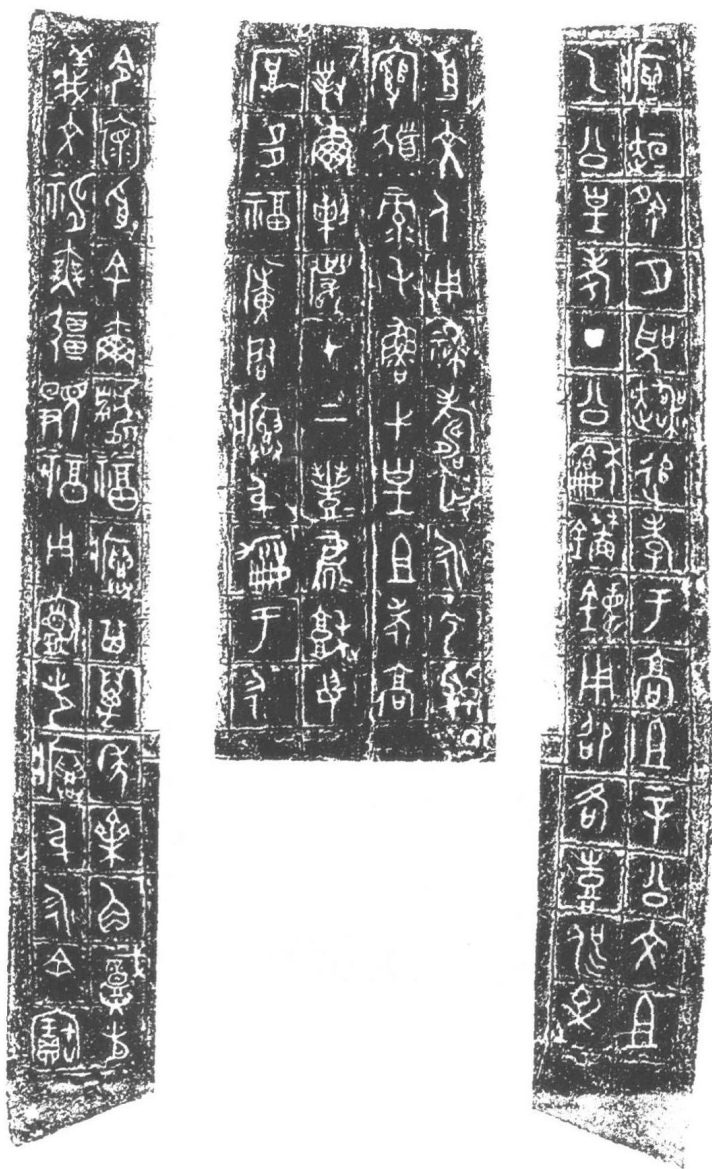


图2 痰钟铭文



图3 盂敦铭文

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

但是，如果把僭越也计算在内的话，正好是四庙。而吕大临的僭越说还不能得到确证。可是，至少四庙说是可以证实的。

（二）对殷墟卜辞中庙制问题的研究综述

自 1899 年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王国维先生在 1917 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对殷墟甲骨文中谥号、庙号的解读，引发了对殷墟甲骨文中庙制问题的研究。1930 年 3 月，刘盼遂先生在《女师大学术集刊》第 3 期上刊发《甲骨文殷商庙制徵》。尽管此文内容简陋又流于浮泛，但是他利用甲骨文史料研究殷商庙制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1937 年 5 月，陈梦家先生在《文学年报》第 3 期上刊发了《祖庙与神主之起源》一文，他试图利用甲骨文史料研究殷代宗族祭祀问题的形成。自此以后，利用甲骨史料对殷商庙制进行研究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0 世纪前期的研究大致如此而已。

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在 1956 年出版了名著《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在此书中，有《庙号问题》上、下两章系统地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到的殷商庙号问题。他认为甲骨文史料中的殷商的干支庙号既非生日得名，亦非死日得名，而是致祭的次序。在研究甲骨文史料中的祭祀时，他的下列发现是值得特别肯定的，即：

卜辞中诸兄、诸子有庙号，却没有诸弟的庙号，这点

应值得注意的。殷制有长幼之别，有兄终弟及的传位法，其意义不在于弟之被尊而在于兄之被尊。殷制之长与周制之长有别，周制一世只有一长，殷制凡兄皆可为长。因此殷代凡在位之兄去世后，其次弟便为诸弟之兄长，相继为王；当他以兄长的资格为王时，不论他以前是否已有为王之兄，他本身成为当时的兄长，死后受到兄长的享祀。(p.459)^①

自有甲骨文以来，陈梦家先生对殷墟卜辞中庙号问题的研究达到了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通过《庙号问题》上、下两章，他研究了殷商王朝大小宗制度、庙号的干支命名、诸母诸兄诸子的庙号和致祭、集合庙主等与此课题有关各类问题，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殷商庙号和宗教祭祀的历史画卷。

1960年，台湾学者金祥桓先生在《大陆杂志》第20卷第8期上刊发了《卜辞中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一文，又一次开启了研究殷商庙制问题的先河。在此论文的上、中、下三篇中，金祥桓先生通过对甲骨文史料的分析，得出了在殷商时期庙制问题尚无定数，并肯定了《汉书·韦玄传》中有关此问题记载的真实性。即：

《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大甲为大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周公为母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由是言之，宗无数也。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然后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是二十几年的沉默。到了1990年6月，朱凤瀚先生在《历史研究》第6期上刊发《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一文。此文的出现标志着近20年来殷周庙制问题研究停滞不前局面的突破，特别是他的结论一反金祥桓先生得出的殷商时期庙制问题尚无定数的观点。他提出了殷商王室宗庙建制问题的四点原则：

第一，直系先王可有自己单独受祭的宗庙。

第二，直系先王单独宗庙可世代保存，未有毁庙制度。

第三，为近世直系先王增设祭所。

第四，只有部分近亲的先王配偶可以有自己的单独的宗庙或受祭的场所。(pp.10~13)^①

他得出的结论是：

在商代晚期商王室已有了较完备的宗庙制度，在宗庙总体构成、设置原则及宗庙活动上，均体现出为强化王权与维护子姓贵族团结服务的特点，从而使宗庙制度成为巩固商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制度。(p.19)^②

1998年，王贵民先生在《文史》第45辑上刊发了《商周庙制新考》一文，他利用甲骨文史料中的有关庙号问题的记

① 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② 同上。

录，研究了殷商宗庙问题的形成。他的新考在于肯定了商周庙制五庙说的存在意义。即：

庙制渊源于宗法制度，并与之同步地形成、确立和演变。庙制依照于宗法的祖迁于上的原理，五庙制是普遍的基本的，初无天子、诸侯等差之异。周为文武特立庙，实属可能，但不能入于庙制常数。天子、诸侯都可能有庙有祧，祧不能算入庙数。商周之际庙制接近完成，立制可以看作在周初。到东周时代宗法面临瓦解，庙制亦有紊乱。(p.36)^①

(三) 对两周金文中庙制问题的研究综述

1937年6月，莫非斯先生在《考古社刊》第6期上刊发《两周铜器中之宗庙及由之而考订其年代》一文。此文第一次以青铜器铭文史料为核心，通过解读两周青铜器铭文中记录的宗庙，力图达到为出土铜器进行断代的目的。约三十年之后，杨宽先生在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中专有《宗庙研究》一章，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也有部分内容利用金文资料论述了殷周庙制发展的历史。诚如上述，和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一书同一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先生也大量引用了西周金文史料中的庙制问题。最近几年来，1998年，王贵民先生在《文史》第45辑上刊发的《商周庙制新考》一文，利用西周金文中的有关庙制内容的铭文史料，研究了庙制在西周时期成熟和固定的历史进程。在国外汉学界，1981年，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末利博

^① 王贵民《商周庙制新考》，《文史》第45辑。

士出版了名著《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一书，在该书中就专有《庙制考》一章研究了甲骨文史料和金文史料中殷周时代的庙制问题。在西周庙制问题中，因为有告庙制度的存在，所以西周金文中有关庙制问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册命制度密切相关，因此，陈汉平博士（《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黄然伟博士（《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以及日本汉学家武者章、吉本道雄博士和香港张光裕博士等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为研究金文中的庙制问题提供了帮助。

（四）考古学对殷周庙制问题的研究

早在上一世纪中叶出版的董作宾先生的名著《甲骨学五十年》一书中就有《殷代的宫室和陵墓》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殷墟考古发掘时所见到的殷代宗庙遗址问题。最近二十多年来，殷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展开，为殷周宫室（宗庙）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实证。1988年，陈全方先生出版了《周原与周文化》一书，该书在第三章《宏伟的西周宫室（宗庙）建筑》一章中利用考古发掘报告，在西周宫室（宗庙）建筑遗址上分析和构想当时宗庙建筑的大致情况。1999年，傅亚庶先生出版了《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一书，该书在第六章《商周时代的庙制》中利用考古史料和先秦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力图重建商周庙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同一年，朱彦民博士出版了《殷墟都城探论》一书，此书在利用历次殷墟发掘报告的基础上，集中总结了殷商宗庙建筑的大致情况。直到本书定稿前不久，我才看到了杨鸿勋先生的大作《宗庙考古通论》一书。这部有关殷周宗庙建筑的考古学研究专著的出版，为本专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理论指导和参考价值。为此，我不得不将本书重新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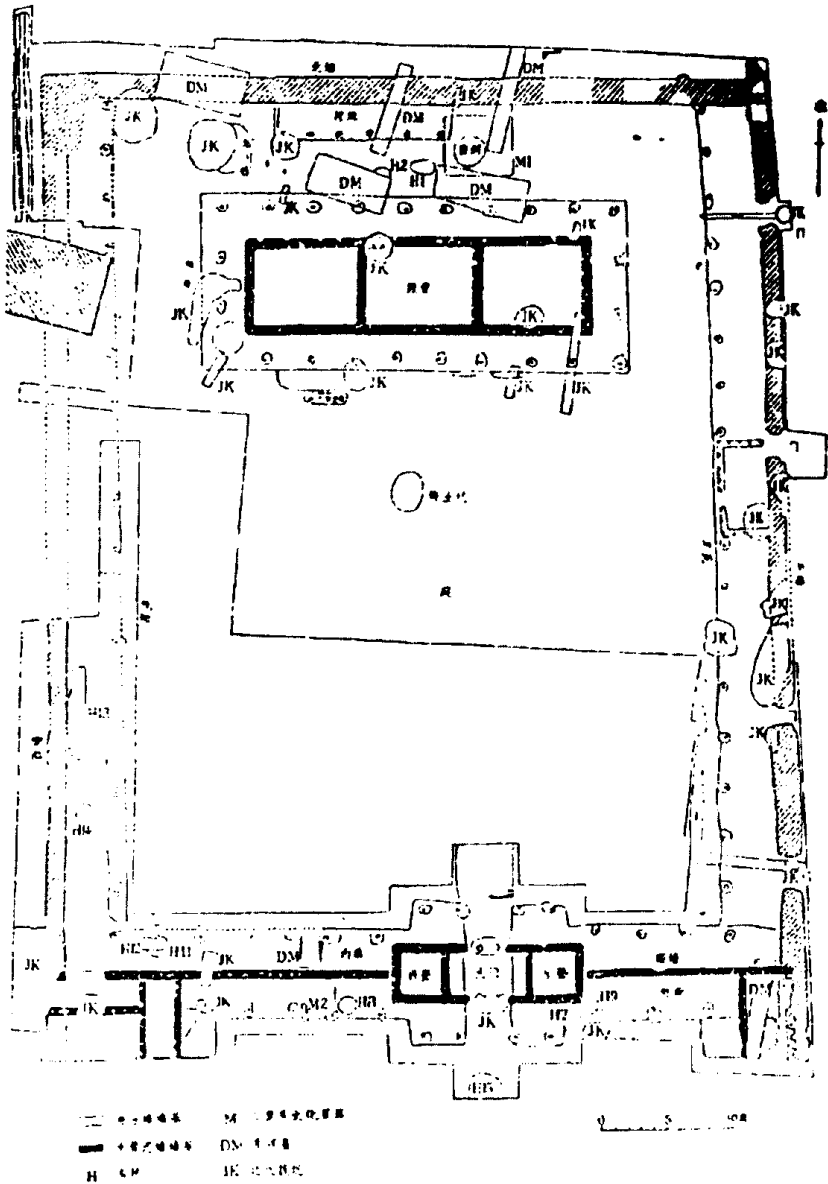


图4 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室遗迹平面图
 (见《考古》1983年第3期)